

先秦文献殷商史料研究

张卉 / 著

先秦文献殷商史料研究

张卉 / 著

责任编辑:汪 逸

封面设计:林芝玉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文献殷商史料研究/张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

ISBN 978 - 7 - 01 - 017910 - 0

I. ①先…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商代 IV. ①K223.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6242 号

先秦文献殷商史料研究

XIANQIN WENXIAN YINSHANG SHILIAO YANJIU

张 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6

字数:451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7910 - 0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先秦文献中殷商史料和考古资料的互证	026
第一节 商代都城	026
一、汤都毫	027
二、太甲徙上司马	032
三、仲丁迁嚣	034
四、河亶甲居相	036
五、祖乙迁庇	038
六、南庚迁奄	041
七、盘庚迁殷	042
八、武丁徂毫	046
第二节 商代方国	048
一、王畿附近方国	048
二、西方方国	058
三、东方方国	079
四、南方方国	086
五、北方方国	090
第三节 商代帝王和大臣	093
一、商代帝王称谓	094
二、商代帝王世系	104
三、商代大臣	106

第四节 社会生产.....	111
一、农业	112
二、商业	115
三、畜牧业	117
四、手工业	118
第五节 政治军事	121
一、官僚制度	121
二、巡狩朝聘	129
三、刑法制度	132
四、军事制度	134
五、盟誓制度	138
第六节 社会礼俗	141
一、丧葬	141
二、祭祀	144
三、卜筮	149
四、养老	152
第七节 文化卫生	153
一、典册文献	153
二、学校教育	156
三、乐舞	157
四、天文历法	161
五、医疗卫生	163
第二章 先秦文献中殷商君臣事迹的层累和剥蚀	169
第一节 汤事迹的层累和剥蚀	169
一、春秋早期之前文献中汤的事迹	170
二、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文献中汤的事迹	173
三、战国中后期文献中汤的事迹	178
第二节 纣事迹的层累和剥蚀	189
一、春秋早期之前文献中纣的事迹	189

二、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文献中纣的事迹	194
三、战国中后期文献中纣的事迹	198
第三节 商代大臣事迹的层累和剥蚀.....	207
一、春秋早期之前文献中的商代大臣	207
二、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文献中的商代大臣	209
三、战国中晚期文献中的商代大臣	215
第三章 先秦文献中殷商人物事迹的类化.....	240
第一节 汤事迹的类化.....	240
一、汤和文王事迹的类化	240
二、汤和武王事迹的类化	245
三、汤和尧、舜、禹、文、武、成王、周公的合称类比	250
四、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的合称类比	254
第二节 纣事迹的类化.....	259
一、纣和桀事迹的类化	259
二、纣和桀、幽、厉的合称类比	267
三、纣和桀、鲁桓公、楚穆王的合称类化	270
第三节 商代大臣事迹的类化.....	270
一、贤王之佐	270
二、昏君之贤	276
三、不令之民	280
四、亡国之臣	282
第四章 先秦文献中人们对殷商史事的运用.....	285
第一节 西周统治者对殷商史事的运用.....	285
一、申明征伐的正义性	286
二、教化殷遗民和方国	286
三、统治者之间的训诫	289
第二节 春秋君臣对殷商史事的运用.....	295
一、兴亡借鉴	296

二、未来预测	303
三、典制解释	306
第三节 战国诸子对殷商史事的运用	310
一、诸子对商代兴亡教训的总结	310
二、诸子对汤武革命的评价	347
三、诸子对商代人物的评价	358
结语	391
参考文献	394

绪 论

先秦典籍中的殷商史料是研究殷商历史所凭借的最早、最主要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史料有如下特点：记载零散而不系统，除了《尚书·商书》、《诗经·商颂》、《古本竹书纪年》、《世本》等文献对商代历史的某些方面有比较集中的记载之外，其他大多零散分布在数十种先秦典籍中；多为后人追记，且在长期流传中经过屡次传抄，被有意无意地篡改和伪造，掺入了后人的论说。因此这些材料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既包含了真实的殷商史的内容，又反映了追记时代人们的思想文化。前人对殷商文献史料已经做了许多的搜集、编纂和研究工作，现从清代之前、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三个阶段回顾如下：

1. 清代之前史家“广涉经史”、“考信于六艺”

西汉司马迁作《史记·殷本纪》，这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系统化的殷商史。此外该书的《夏本纪》、《周本纪》、《三代世表》、《伯夷列传》等也涉及殷商史事的记载。司马迁记载殷商史事时，对先秦和汉初的商代史料进行了全面的搜集和考察。《太史公自序》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又《三代世表》：“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可知其搜集文献史料之广泛，包括六经、百家杂语、谱牒、旧闻等。同时司马迁对这些材料又有所取舍，《殷本纪》：“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可知西汉时流传下来的典籍繁多，而司马迁以儒家“六艺”，也就是《易》、《书》、

《诗》、《礼》、《乐》、《春秋》作为真实可据的标尺。

北宋刘恕作《通鉴外纪》十卷,记载了自上古传说时代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的历史,与《通鉴》相衔接,是一部古史名著。《通鉴外纪》卷二为《夏商纪》,刘恕将分散在先秦各种书籍中的殷商史料整汇排比,编成了自成汤至商纣王,三十君、十七世、六百九十二年的殷商历史。胡克家称此书取材极广,“所采自经说、史传、诸子百家而外,旁及谱牒、谶纬、卜筮、占验之书,不下二百余种。”^①而刘恕在广采旧闻之时,仍然是以六艺作为可信的依据,如在其论及上古三皇、五帝、三王存在与否时,认为:“《诗》、《书》,仲尼勘定,皆不称三皇、五帝、三王。”^②对上古这些圣王的存在提出了质疑,其标准是《诗》、《书》。

南宋罗泌作《路史》四十七卷,其中《国名纪》八卷,涉及殷商时期的诸国姓氏和地理。此书广征博引,资料极为丰富,陆心源称其:“学博才宏,侈游坟典,乃搜集百家,成《路史》四十七卷。”^③据学者研究,罗泌引书涉及经、史、子、集、谶纬、佛道各类典籍近八百种。^④

清代马骕作《绎史》一百六十卷,其中第十四卷至第二十卷记载殷商史事。马骕把殷商史分为七个部分,分别是:商汤灭夏、伊尹辅太甲、太戊盘庚之贤、武丁中兴、周室始兴、文王受命、武王克殷。此书取材极广,马骕自称:“取三代以来诸书,汇集周秦以上事,撰为《绎史》……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疑,真赝错杂者,取其强半,附托全伪者,今存要略而已。称述古事,兼为采缀,以观异同。若乃全书阙轶,其名进谏,纬谶诸号,尤为繁多。则取诸笺、注之言,类萃之帙,虽非全璧,聊见一斑。又百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事异。互见叠出,不敢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⑤可知在材料上,除儒家经典外,马骕广采百家学说,将经、史、子、集一例看待,互相印证,尽可能多地保存资料。

从上可知,清代之前史家在编纂殷商史时,对各种文献中记载的殷商史料

① 胡克家:《资治通鉴外纪·注补序》,清同治光绪间江苏书局刊本。

② 刘恕:《通鉴外纪》卷二,《四部丛刊》本,第35册。

③ 陆心源:《宋史翼》,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18页。

④ 朱仙林:《罗泌〈路史〉引书研究——以先秦诸子为主》,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⑤ 马骕:《绎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页。

进行搜集和考订,判断其真伪可信程度,进而取舍编纂,其总体原则是“广涉经史”、“考信于六艺”。

2. 民国时期学者“疑古”和“新证”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等学者掀起疑古思潮,他们继承清儒辨伪的学风,进一步怀疑古书、古史。顾颉刚说:“辨伪事固是直接整理历史,辨伪书的也是间接整理。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①又“故事是古史料的一部分,必须把古书的本身问题弄明白,始可把这一部分的材料供故事的采用而无谬误,所以这是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②钱玄同提出:“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③可见古史辨工作的重点是关于古书和古史的,皆属于上古史料学的范畴。这个时期疑古学者对上古史料的考辨成果主要汇编在《古史辨》七册中(1926—1941年间编辑出版),其中涉及不少殷商史料的考辨,如顾颉刚的《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一文,考察了先秦至汉代文献中对纣的事迹的记载,来证明其“古史层累”学说。^④此外还有梁启超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论及考辨古书的方法,并对两汉之前14部书进行辨伪;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对清人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以及顾实、姚名达等人对该书的考辨给予补正;张心澂的《伪书通考》辨伪书1104种。上述诸书也多涉及对文献中记载的殷商史料的考辨。综观这个时期疑古学者对古史史料的考辨,在相当程度上廓清了有关中国古书古史中的荒谬传说,为中国古史研究在史料方面做了清扫尘障的工作。余英时认为:“在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的范围内,顾先生的累层构成说的确建立了库恩(Thomas S. Kuhn)所谓的新典范(Paradigm),也开启了无数解决难(Puzzle-Solving)的新法门,因此才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⑤但是古史辨学派对古书怀疑过度,对此后来学者多有批判,如杜正胜说:“顾颉刚

^①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② 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③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

^④ 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2—96页。

^⑤ [美]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0页。

先生不懂传说,也不太能把握历史的重心,以古书之真伪断定历史的真伪,到头来只是整理古书,不是整理古史。疑古派的通病如此。他们整理古书的方法不外校勘、训诂、考据、音韵,其所出于乾嘉范围者,大概是勇于怀疑,果于自信而已。”^①又董作宾指出:“大家都知道,风靡全国,震惊一世的大书《古史辨》……讨论遍三皇五帝,夏商周的一切纸上史料,《诗》、《书》、《易》、《礼》、诸子百家的书籍。十大本《古史辨》,主要的观点只是一个‘疑’,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信念之下的极端怀疑。这当然是属于革命性、破坏性的。我国古代文化所寄托的一部分‘纸上材料’,经过这样一‘辨’,几乎全部被推翻了。疑古的新史学影响所及,东西洋的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问题为之四顾茫然,不知所措。谨慎一点的人,只好从商代讲起,再谨慎点,最好讲西周春秋以后。”^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考古学的兴起,新资料的不断发现,给学界带来了巨大震动,王国维指出:“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卷,内閣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案,此四者之一,足以当孔壁汲冢所出。”^③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用考古材料来证明古书史料,被称为“新证”之学。傅斯年提出应该把文献中的古史材料当作“间接材料”,把地下出土的材料作为“直接材料”,认为“一旦得到一个可信的材料,自然应该拿他去校正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错误靠他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弥补”^④。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⑤“新证”学派的代表著作有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于省吾的《双剑謬群经新证》、《双剑謬诸子新证》、《双剑謬诗经新证》、《泽螺居楚辞新

^① 杜正胜:《中国上古史论文选集》,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② 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大陆杂志》第三卷十二期,1951年。后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12—613页。

^③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五),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④ 傅斯年:《史料略论及其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⑤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证》等。这些著作都是运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考证文献材料存在的问题,其中多涉及殷商史事,如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把文献中的殷商史料和甲骨文、金文材料结合,论及商代先公先王、商代诸臣、商代都邑及诸侯等诸多问题。

总之,民国时期学者对文献古史史料的研究,为后来学术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如对文献资料记载的古史古事,只有在考察其可靠性和可信性之后才能被认可等,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现代中国古史学者的共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者对殷商文献史料的多角度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地下出土的先秦文献资料不断发现,使得古史史料学得到了深入的发展,谢维扬指出:“近年来中国古代早期文献文本的不断发现对于治古史而言,除提供给我们大批新资料而外,最深远的意义莫过于对古史研究的史料学基本概念的问题,促使人们根据对新资料的研究从更多方面做一些反思,以获得某些新的认识。”^①现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上古史料问题进行研究,努力寻求建立更为合理的史料学基本理论。

在史料学著作中,学者多有论及殷商文献史料的篇章,如陈高华、陈智超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一章对殷商史史料做了概述,其中涉及传世文献史料。王晖、贾俊霞的《先秦秦汉史史料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章是殷商时代的史料,认为商代文献资料包括《尚书·商书》、《诗经·商颂》、诸子及战国文献中所见的《商书》、《史记·殷本纪》、《尚书》中《周书》部分的商代史料、古本《竹书纪年》中的商代史料、《楚辞·天问》中的商代史料,并且对这些史料的价值进行了探讨。

在殷商史著作中也有专门论及殷商文献史料的篇章,如彭邦炯的《商史探微》(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一章序论中有关于研究商史的文献史料的概述,提出历代相传的文献典籍包括《尚书》里的《商书》,《诗经》里的《商颂》,《周易》里的卦爻辞,《史记·殷本纪》以及其他先秦典籍如《逸周书》、《国

^① 谢维扬:《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面对的主要问题》,《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语》、《左传》和先秦诸子著作里有关商代的逸文逸事，等等，都是我们今天研究商代历史的重要材料和根据，并且提出了对于传世文献中的殷商史料，我们应该广取博收，披沙拣金，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探索商代历史。

此外学者还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考察文献中的殷商史料，如李幼蒸的《儒学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其中第一部分为殷商编，重点说明如何处理先秦文献中的殷商史料和考古资料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前人对殷商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对本书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但是总体来看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缺乏全面的搜集和整理。清代之前的史家都是从编纂殷商历史的角度出发，搜集考订史料，其必有轻重取舍，如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主要取材于《尚书》、《诗经》，而对诸子百家之语多不采用。又如清代马骕的《绎史》所载资料堪称丰富，但是其在《征言》说“列在学官四子之书不录”，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没有收入。此外其在引用搜集材料中仍有识别不精之处，《四库全书总目》云：“（《绎史》）虽其疏漏抵牾，间亦不免。”王利器在《绎史·整理说明》中指出马骕鉴别史料有以不误为误者，有以讹传讹者，有删节未当者，有引书不具备者。^①近代有专门研究殷商文献史料的论著，但多是概述和介绍性的，也没做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二是缺乏系统、多角度的研究。殷商文献史料的最大特点是其多为后人追记，且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经屡次传抄，被有意无意地篡改和伪造，掺入了后人的论说，因此这些材料具有更多的内涵，不仅含有真实的殷商史的内容，还反映了追记时代人们的思想文化。前人对殷商史料的研究，多是将其视为殷商客观史实的承载物，认为一篇历史文献的价值便在于它叙述了多少“真实的过去”，而没有对其所蕴含的其他“史实”进行多角度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余英时指出，史料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审定文献的真伪、性质、意义，然后再在这种基础上重建历史陈迹”；二是“并不取这种被动的方式，而是主动地组织文献，把文献分出层次，勒成秩序，排作系列，定出关系，并确定何者相干何者不相干等等”^②。王明珂也强调，我们应该将文献史料作为一种

^① 马骕撰，王利器整理：《绎史·整理说明》，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页。

^② [美]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0—411页。

“社会历史记忆”，然后由史料分析中，重新建构对“史实”的了解，那么由此所获知的史实，“不只是那些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景”。“并且研究者要关注这是谁的记忆，他们如何被制造和利用，以及他们如何被保存和遗忘。”^①两位学者主张把文献中的客观事实和主观因素结合起来，重新审视古文献的形成和价值。既考察记载的史事，还要关注史料文本的记载、选择和描述特征，探索这些史料如何被制造、利用、保存和遗忘，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这种方法超越了简单的对文献史料的崇信或怀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思路。

在上述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本书搜集先秦文献中的殷商史料，对其进行分类组织，重点从三个角度来进行考察，首先讨论先秦文献所载殷商史料的真实性，其次分析史料文本的记载和描述特征，最后探讨这些史料所折射出的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具体分为四章：先秦文献中殷商史料和考古资料的互证；先秦文献中殷商君臣事迹的层累和剥蚀；先秦文献中殷商人物事迹的类化；先秦文献中人们对殷商史事的运用。

二

先秦文献典籍流传至今的约有六十种（包括辑佚书），^②本书参考前人研究成果，把涉及的先秦文献按其性质分为六艺、史书、子书、诗赋、兵书、方术六类，并对其成书时间作一概述。

（一）六艺

1.《周易》^③

《周易》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卦辞和爻辞属于经；彖辞、象传、系辞传、文

^①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9—32页。

^③ 本书所用版本为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称为传。其成书年代不同，现分述如下：

《易经》，《史记·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可知司马迁认为《周易》卦辞、爻辞为文王所作。当今学者一般认为《周易》的卦辞、爻辞成书于西周早期。^① 本书涉及《泰》、《升》、《归妹》、《既济》等部分。

《易传》，《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司马迁认为《易传》为孔子所作，后人对此提出怀疑，如欧阳修的《易·童子问》认为《易传》不类圣人之言。随着近来简帛书籍的发现，当今学者认为《易传》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在子思时代已经有了。^② 本书涉及《彖传》、《象传》、《系辞下》等部分。

2. 《尚书》^③

《汉书·艺文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又：“《经》二十九卷。”颜师古注：“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这里的二十九卷是伏生传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在西晋永嘉年间亡佚，今天所见古文《尚书》是东晋梅赜伪作，故本书只取今文《尚书》。其各篇成书时代不同，现就本书涉及的篇章分别讨论如下：

本书涉及《商书》七篇，包括《汤誓》、《盘庚》（三篇）、《高宗肜日》、《西伯堪黎》、《微子》。王国维先生认为：“则《商书》之著于竹帛，当在宋之初叶矣。”^④ 这些篇当都是商代文献，经过后人流传转译，由东周初年宋人写定，故文辞浅近平易。

本书涉及《周书》十一篇。《牧誓》，《书序》曰：“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此说是武王伐纣所作誓词。但是《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此说是周公所作。周初《利簋》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日子也是“甲子”，和《牧誓》一致，证

^①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 页。

^② 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105 页。

^③ 本书所用版本为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④ 王国维：《高宗肜日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1 页。

明了此篇的可靠性,故《牧誓》应是武王伐纣誓师的记录,但是其文辞相对平易,是流传中受东周人的习惯影响所致。^①《洪范》,《史记·周本纪》曰:“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宣告。”又《书序》曰:“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可知《洪范》是周武王访问箕子的谈话记录,但在流传中也经过加工,其写定在春秋前期。^②此外《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多士》、《君奭》、《无逸》、《多方》、《立政》九篇学界多认为是周初作品。

3.《诗经》^③

《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今《诗经》共三百零五篇,本书涉及十三篇,其各篇成书时代不同。

《大雅》,学界多认为其年代在西周时期,本书涉及七篇,分别是《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文王有声》、《荡》。

《鲁颂》共四篇,本书涉及一篇,即《閟宫》,该篇有“周公之孙,庄公之子”,可见此篇为鲁僖公时期的作品,属于春秋早期。

《商颂》五篇,分别为《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本书均有涉及。《史记·宋微子世家》曰:“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郑玄《诗谱》云:“自后政衰,散亡商之礼乐。七世至戴公,时当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孔子录《诗》之时,则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备三颂,著为后王之义,监三代之成功,法莫大于是矣。”可知《商颂》是春秋初年宋国正考父根据商周流传下来的文献而作。

4.《周礼》^④

《周礼》原名《周官》,《汉书·艺文志》:“《周官经》六篇。”《隋书·经籍

^①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41页。

^②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18页。

^③ 本书所用版本为毛亨传,郑玄注,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④ 本书所用版本为郑玄注,贾公彞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志》记载《周官礼》十二卷，并记载了此书的由来：“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今本《周礼》六篇，学者一般认为成书在战国中晚期。^① 本书涉及《春官·宗伯》、《春官·大卜》、《春官·筮人》等篇。

5.《仪礼》^②

汉代把《仪礼》称作《礼》或《士礼》，《汉书·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又：“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隋书·经籍志》：“《仪礼》十七卷。”可知汉代有今文《仪礼》十七篇，古文《仪礼》五十六篇，至唐只有今文十七篇，古文不传。今本《仪礼》十七篇，其成书当在春秋末年至战国中期。^③ 本书涉及一篇，即《士冠礼》。

6.《礼记》^④

《汉书·艺文志》：“《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隋书·经籍志》有《礼记》的记载，并指出：“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礼记》虽是西汉戴圣所删定，但是大多来自孔子七十

^① 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1932年第11期；郭沫若：《〈周官〉质疑》，《郭沫若文集》第14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1页；屈万里：《先秦文史资料考辨》，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339页。

^② 本书所用版本为郑玄注，贾公颜疏：《仪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③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文史》第十五、十六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王辉：《从考古与古文字的角度看〈仪礼〉的成书年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

^④ 本书所用版本为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